

葡萄牙现代化为何陷入先发后至困境

□ 王本立

纵观西欧现代化历程，民族国家形成和地理大发现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启动因素。在西欧国家中，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先发后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断裂性特征。葡萄牙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早在15世纪，葡萄牙就已经同时具备上述两大要素。葡萄牙不仅是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最先开启地理大发现，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直到20世纪后期才得以建成现代化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比荷、英、法、德等后起国家迟到了数百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度依赖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等外部因素，却长期忽视国内经济的发展，导致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不足。

民族国家形成让葡萄牙率先站在现代化起点

就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民族国家的出现是欧洲现代化的起点，也是欧洲现代化的载体。葡萄牙较早出现独立的民族意识，是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起初，葡萄牙依附于莱昂王国。在光复运动中，葡萄牙首领阿丰索·恩里格斯于1140年宣布称王，并于1143年和1179年先后获得莱昂国王和罗马教皇的正式认可。葡萄牙由此完全独立。从1147年起，葡萄牙王国开始断断续续向南扩张，并于1249年基本实现南北统一。通过1297年阿尔卡尼条约，葡萄牙与地处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划定边界，基本奠定了当今葡萄牙的国土面积。随着独立和统一的完成，14世纪时葡萄牙民族国家已经正式形成。

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在不断强化的王权主导之下，葡萄牙在最初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几乎是在全方位，成就也相当可观。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产业的多样化。例如在沿海一带，捕鱼、制盐业成为主要产业，造船业也开始萌芽。其次，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商业活动和农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被纳入欧洲经济范畴。最后，伴随着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里斯本等一批城市也很快发展起来。在社会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平民队伍分化加剧，城市里的商人和农村里的大农场主很快成长为一个新的富豪阶级，而贵族则日益贫困。在文化教育方面，大约在13世纪，在葡萄牙语基本形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葡萄牙文学运动。教育也逐渐越出修道院和教堂的门槛，开始向世人开放，并在综合学校的基础上诞生了里斯本大学这样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作为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不仅率先站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而且生机勃勃，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

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通过殖民扩张攫取巨额财富

从14世纪中期开始，葡萄牙的经济发展势头接接受到重创。1348—1349年的黑死病、1368—1397年对外战争以及1383—1385年国内政治动荡等，给葡萄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人口下降、农业凋敝、贸易衰退、社会矛盾突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上半叶。

此时的葡萄牙并没有继续立足国内经济发展，而是将解决问题的办法寄托于大规模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在欧洲国家中最早开启了地理大发现进程，率先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1415年，葡萄牙若昂一世和亨利王子率领一支由1.9万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军队，攻占了非洲西北角的重要城市休达。自此，葡萄牙拉开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序幕并开启延续500年之久的海外殖民统治。在打通西欧至印度的航路后，葡萄牙逐步向印度洋和太平洋进行殖民扩张。16世纪，葡萄牙确立了印度洋上的海上霸权。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通往东南亚的咽喉要道马六甲，进而强占了澳门，等等。

通过上述殖民活动，葡萄牙先后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建立殖民地，并逐步建立起称霸约一个世纪的全球性殖民帝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期间，葡萄牙凭借对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垄断，通过贩卖黑奴、掠夺黄金、垄断香料贸易等方式，攫取了巨额财富。

葡萄牙发起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扩张，刺激着西欧各国走向殖民掠夺的道路。从此，西欧各国开始打破地区隔绝，大肆进行海外殖民掠夺和充满暴力血腥的殖民统治，为其走向工业化攫取了大量原始积累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作为西欧最早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国家，葡萄牙通过海外殖民掠夺获得了一时的财富和繁荣。15至16世纪的葡萄牙貌似早已具备快速推进现代化的条件。然而，葡萄牙帝国并没能称霸近百年后继续在西欧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反倒因为地理大发现后过度依赖殖民掠夺、殖民贸易和海外市场导致现代化进程长期断裂。

内生动力不足导致葡萄牙现代化进程长期断裂

国家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国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葡萄牙在海外疯狂掠夺的同时，国内各个重要领域却没有取得同步发展。葡萄牙的现代化不仅没能正常延续，而且很快陷于停顿，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扩张的开展，葡萄牙的注意力和战略重心迅速地由国内转向了国外，导致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而且严重依赖殖民掠夺和极不平等的殖民贸易。葡萄牙王室及贵族将大量财富主要用于购买奢侈品（如丝绸、珠宝）、修建豪华官殿以及宗教和战争活动，而长期忽视国内经济生产，导致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滞后，形成依赖贵金属输入的经济模式，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垄断东方贸易的大约百年时间里，葡萄牙国内的经济却

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不仅进口的货物与以前没有多大区别，就连工业生产也与13世纪相差无几。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消费品因国内无法生产而只能依赖进口。

正因为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葡萄牙虽然在起初握有先机之利和强大的海上实力，但并不具备而且始终没有培育出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葡萄牙人不仅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很快就因浪费造成亏空和东方殖民霸权不断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依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葡萄牙人只知道挥霍来自殖民地的不义之财，而不重视培育和发展内生动力。

由于上述基本原因，葡萄牙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只充当了财富源源而入又源源而出的中转站，却忽视了发展国内生产力。再加上香料贸易的迅速衰落和地中海商路的重新活跃，从16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经济已开始入不敷出，日益困难。于是，当同样具备了海上实力且国力已得到相当发展的荷兰和英国开始向葡萄牙的霸权发起挑战时，葡萄牙已明显落后了。

总之，在整个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帝国鼎盛时期，葡萄牙通过殖民掠夺攫取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在给殖民地人民带去沉重灾难的基础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同时也丢失了立足国内经济的发展根基。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导致葡萄牙帝国存续约百年之后逐渐沦为欧洲的落后国家，并深刻影响葡萄牙现代化进程数百年，使葡萄牙现代化带有明显的长期断裂性和落后性。

葡萄牙早期现代化历程也揭示出，忽视国内经济发展单纯依赖国外市场的现代化道路是行不通的；通过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推进现代化，不是现代化发展的“人间正道”，也是不可取的、难以长久的。



盘龙城遗址位于武汉市北郊，南邻长江的支流府河（潏水），处于桐柏山、大别山山系与江汉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因山势走向，区域内有多条河流从北部山系发育，自北向南汇入长江，该区域由此成为沟通南北、串联东西的交通枢纽。而进一步顺长江而下，邻近的赣北和皖南地区又是长江流域铜矿资源的富集地带，是中国早期青铜时代重要的金属资源产地。从夏商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不断对这一区域展开经略，使之成为开创整个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的关键区域。

揭示长江中游早期文明发展进程。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在20世纪70年代，遗址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城垣、大型的宫殿建筑、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陶器和玉石器，表明长江中游已进入青铜文明的阶段，这些发现推动了长江、黄河共同为中华文明摇篮共识的形成。自2013年以来，盘龙城遗址展开了持续性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揭示出长江中游这一阶段的文明发展进程。

盘龙城城市聚落主体年代为夏代晚期至商代中期，大致延续有350年的时间。伴随着中原王朝向南扩张，盘龙城城市聚落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聚落面积仅约5万平方米，中心区位于遗址南部的王家嘴地点，多见有小型的房址、灰坑、灰沟等遗迹。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盘龙城遗址最早阶段的年代大体可对应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

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商代早期，出现中心城垣，城垣内有大型的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以及围绕城垣的一般居址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中心城垣的面积约8万平方米，而整个城市聚落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成为这一时期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并对周边区域形成了广泛的辐射和影响。

盘龙城城市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商代中期，聚落进一步向北部区域发展，城市中心转移到北部的杨家湾地点。在该地点发现有遗址晚期的大型建筑基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群。遗址北边缘地区则分布有中小贵族和平民墓地。盘龙城城市聚落大约在中商晚期被废弃，之后地区兴起如郭元咀、庙台子等聚落，地方青铜文化开始逐步兴起。

夏商王朝经略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城市。盘龙城是夏商王朝在长江中游设立的中心城市，遗址集中体现了黄河中游中原文化对长江中游的影响，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中央政府治理地方的考古样本。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与同时期中原二里头、郑州商城、小双桥等都邑遗址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盘龙城遗址古人日常生活习惯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致，建城的主要人群也多从中原王畿地区直接迁徙过来。与中原地区贵族墓葬相近，盘龙城贵族墓葬随葬以青铜觚、爵、罍为核心，并通过数量的多寡彰显出身份与地位。盘龙城贵族墓葬还出土一件绿松石镶金饰件，类似于近年郑州商城书院街二号镶嵌金绿松石兽面形装饰。盘龙城铜、玉等奢侈品形态特征、使用方式均与中原郑州商城表现一致，进一步展现出盘龙城上层贵族礼仪规范对于中原王朝的认同。此外，盘龙城城市的营建理念、筑城技术也深受中原王畿都邑的影响，其聚落布局、大型城垣和建筑的营建方式、墓葬结构与葬俗也多能在中原郑州商城同要素中找到相似之处。盘龙城建城人群主体来自中原地区，贵族礼仪规范和城市布局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推断城市的组织管理和政治运作，也应处于中原商王朝的管理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遗址群，展现出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的区域性控制。从盘龙城出发，顺长江而下至大别山南麓到赣北地区，同时期可见有意志寺、铜岭、龙王岭、莽麦岭等次级聚落，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铜岭遗址位于赣北铜矿区，曾发现商代的铜矿采、冶活动。莽麦岭遗址也曾发现铜矿石。中原王朝向这一区域的扩张，或源于对青铜金属矿藏的需求。此外，沿长江而上至洞庭湖东岸、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流域，又可见铜鼓山、荆南寺、宝塔、皂市等次级聚落，同样显示出中原文化和盘龙城遗址的影响。可见，夏商时期中原王朝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经略，是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外拓展，并由此构成了一种中央对地方多层次、网络状的治理，为迄今所见中央政府治理地方最早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盘龙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从考古看文明

（上接1版）

冷静清醒认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聚焦重点领域、锚定整治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作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校园政治生态呈现向上向好态势。同时，要清醒地看到，“象牙塔”内绝非一片净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同样精准适用于高校。一些高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还不够有力，责任压力传导还不到位，正风肃纪反腐还存在薄弱环节，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党治校还有不足，“四风”问题禁而未绝，个别教师师德失范、导学关系异化、学术不端等问题时有发生。尤其是近年来查处的部分高校领域腐败案件发人深省，反映出部分高校权力设置与运行机制不科学不严谨的问题及隐患尚未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

高校是群众普遍认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道德高地，一旦出现不正之风、腐败问题，比其他领域危害更大、影响更恶劣。必须着眼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坚决抓好高校领域突

出问题系统整治。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推进管党治校，推动“两个责任”同向发力，聚焦突出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纠治不正之风、师德失范问题，推动完善高校治理体系、规范高校权力运行、净化高校政治生态。主要任务是重点整治高校招生和基建工程领域问题，完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规范和内控机制，推动高校基建工程高效、协同、廉洁运行；常抓不懈整治师德师风问题，加快形成教育涵养常态化、日常监管制度化、考核评价科学化、规范惩处严格化的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良好局面；持续整治后勤管理和科研经费领域问题，实现后勤保障工作公益性和经济性的协调统一，促进高校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继续巩固校办企业和附属医院领域整治成效，提升规范管理水平，建立长效机制。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任务部署落地见效

做好高校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须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拧紧责任链条，采取有力举措，

持续完善治理体系、净化政治生态，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教育强国提供坚强保障，不断赢得社会赞誉、师生口碑。

紧紧压实各方责任，一体贯通联动抓好整治。系统整治涉及面广、层级多，必须以“两个责任”抓纲带目，推动党组（党委）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等同向发力。教育部党组牵头统筹推进全国高校，并具体负责教育部直属高校系统整治。各有关部委党组（党委）和各地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高校隶属关系，条块结合指导所属高校开展系统整治工作。各高校党委承担系统整治的主体责任，全面推进本校系统整治组织实施；各高校纪委协助党委抓好整治，持续加大监督执纪力度。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筹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监察系统体系优势，加强“室组地校”贯通协同，强化“组组”联动、“组地”联动，推动各方责任主体负其责、严管所辖，形成齐抓共管良好局面。

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严肃查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严抓严管、务求实效。重点关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对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新提拔干部加强监督和提醒，强化